

河山阙



买办家庭出身进步青年的租界记忆
书香人家辗转半个中国的迁徙与流亡

董贻正 薛传钊 著

亲历抗战
1937-1945



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

河山阙



买办家庭出身进步青年的租界记忆
书香人家辗转半个中国的迁徙与流亡

董贻正 薛传钊 著



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河山阙/董贻正著. —成都: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, 2015. 8
ISBN 978 - 7 - 5504 - 1964 - 3

I. ①河… II. ①董… III. ①回忆录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51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27009 号

河山阙

HESHANQUE

董贻正 薛传钊 著

责任编辑:汪涌波
助理编辑:白宇
特约编辑:孙明新
封面设计:杨红鹰
责任印制:封俊川

出版发行	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(四川省成都市光华村街 55 号)
网 址	http://www.bookcj.com
电子邮件	bookcj@foxmail.com
邮政编码	610074
电 话	028 - 87353785 87352368
照 排	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
印 刷	郫县犀浦印刷厂
成品尺寸	152mm × 225mm
印 张	14.5
字 数	135 千字
版 次	2015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 - 7 - 5504 - 1964 - 3
定 价	35.00 元

版权所有,翻印必究。

目录

从十里洋场到故都清华园

- 我家踏入上海滩之路/002 父亲剪影/006
- 儒家范式的家庭教育/013
- 父亲新中国成立前的“左派”朋友/017 外婆家原系大家族/019
- 小嬢嬢是新四军/022 十里洋场少年时/026
- 从手心挨打到银盾少年/027 我知道的八百壮士/030
- 亲戚中就有汉奸/032 虎头蛇尾的奴化教育/035
- 租界里的生计/037 租界里的中学生活/039
- 旧上海的少年阅读/042 战争阴霾下的课余生活/045
- 中学同学的不同人生路/046 抗战胜利啦!/048
- 亲见国民党丧失人心/050 离延安更近了/052
- 我成了“赤化嫌疑分子”/056 开始了进步的道路/057
- 大江东去晓光始/059 我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进步学生运动/062
- 用“单戈士”的笔名向进步报刊投稿/067
- 1948，我要考大学/069 马桶上听到录取的消息/071
- 一路向北/073

辗转半个中国的迁徙与逃亡

- 最早的家教/076 从未团聚过的家/078
- 入读武汉圣约瑟女子学校/082 被战争打乱的童年 /086
- 初次闻到火药味/088 我家成了难民转运站 /090
- 热闹非凡的难民之家 /094 战争中的桃花源 /098
- 像上班一样躲警报/100 边境小城印象/104
- 德归医生治好我的黄病/108 再次踏上逃亡之路/110
- 荒山生活要自给自足 /113 锡是怎样炼成的? /116
- 矿山里的学习生活/121 父亲自制“咖啡糖” /125
- 战争中的大家庭/128 长途跋涉到玉山/137
- 难忘的六年级/143 日军打到浙赣铁路，再次逃亡/146
- 与“鬼火”相伴的住地/153 初次接触洋文化/160
- 战乱中难忘的春节/163 跟着难民继续大逃亡/166
- 掷垒球训练/175 见识了民族风情/178
- 山沟里的机场/180 去重庆/182 闯进卫戍司令部/189
- 15岁挑起家中的担子 /195 自建小茅屋/200
- 小茅屋落成 /203 进了南开暑期班/206
- 抗战胜利，狂欢之夜 /208 李四光是我的推荐人/210
- 李四光镇不住势利眼 /211 振济中学，一场虚惊/213
- 附注：抗战历史参考资料/218

从十里洋场到故都清华园

董贻正

我是1931年12月生于上海，祖籍浙江宁波。1936年8月上小学，还不到5周岁；以后上初中、高中，直至大学。1948年报考大学，报了3所，都被录取，于是北上清华，1952年8月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。

抗战胜利后，对国民党从期盼到失望，接触到进步思想，参加了学生运动；新中国成立前在清华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——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，因此就成了离休干部。1994年办了离休手续。

我家踏入上海滩之路

我们董家到底祖先是谁？现在市面上也有不少出售的谱

系，但都不一定完全贴谱。新中国成立前我曾在家里见到过两本家谱，蓝缎封面，里面是红色竖格线。印象深的是列出了辈分的排序，大约有二三十字，现在记得的只有我父亲一辈是“裕”，我父亲名裕昌，字敬庄，我们这一辈是“贻”，下一辈是“谋”，再下一辈就记不得了。在我这一代，有关家谱的传承观念比较淡漠；至于下一代，他们更没有接受过这种宗族与传承的教育，而且也没有了有形的家谱可以依据，所以对宗谱的概念更加淡漠，甚至可以认为是文化的断层了。

尽管时间久远，我仍旧记得在家谱中的我所知道的名人有董仲舒，我很怕看到臭名远扬的董卓，在家谱中倒没有。可惜，这两本家谱，“文革”后回家，就没再见到，现在再下一代的排行与辈分，我们兄弟谁也不知道了，兄弟中就算有生了孙子辈续了香火的，也不知道香火该供向何方庙宇。年轻的时候，主要是受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，把家谱当成封建的东西，根本不当回事，错过了一些寻根的机会。现在想来，还是感到很遗憾的。

我是祖父去世后的第二天出生的，因此从未见过祖父。

小时候，曾见过装在镜框里祖父的画像，只记得他瘦瘦的脸庞，面容安静，目光沉静地看着我们，其他就毫无印象了，至于他的名讳董华卿还是后来在墓碑上看到、因此记住的。那张唯一的照片父亲一直保存，但是后来整个社会都经历了各种

动乱，那么老的照片自然也找不到了。

对祖父的身世、经历，过去我是一无所知。后来看到我父亲在“文革”中的交代材料《三代简史》，才知道我祖父当初家庭经济状况也很拮据。他十三四岁时，就到一家做香粉的手工业作坊当学徒，以后因工作勤奋，办事认真，被另一位老板看中，允以较高工资和职位，直至升为经理。稍有积蓄后，伙同友人在慈溪开设了一家杂货店。辛亥革命后，该店倒闭，祖父就带着父亲到上海找工作。

祖父的坟在一个紧挨着农田的小山包上，离居民区不远，山上就只有这一个坟墓，丝毫没有损坏的痕迹。走到他的坟前，已然不知祖辈们祭祀的规矩，看清并记住了祖父的名字，朝他的坟头鞠躬，眼前隐约闪现着他瘦瘦的面庞，似笑非笑但眼神安定。

至于祖母，虽然从小我们就住在一起，但名讳却根本不知道，甚至在墓碑上刻的就是蔡太夫人，连个名字都没有。看来那时并不是人人都有名字的。或者遵循中国的概念，女人以夫为天，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，因此将人生都隐在男人背后。在男权为尊的时代，女人的名字似乎没那么重要了。尽管我们这些做子孙的，身上留存她的血脉，但是对她是否有过闺名字号，也更无从考证了。她和同时代的很多老人一样，是虔诚的佛教徒，每逢农历初一、十五，以及一些佛教节日，都要吃素，记忆中她很少诵经，也很少去佛寺参加佛教活动，只是

经常拿着佛珠，口诵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每念一句，就拨拉一颗佛珠。她为人和善，对孙辈们和保姆都不会大声说话。

我十一二岁时，祖母病故了，那时候是20世纪40年代初的上海，我们住在租界内，当时在上海之外，抗日战争进行到最艰苦卓绝的时候，但是租界里还相对安全和安宁一些。那时候经济条件好或者是有身份的人家，对长辈的丧事都很看重的。信佛的就要找名寺古刹来办，还要做佛事。不仅出殡有礼仪，而且从“头七”（人亡故后第七天）到“七七”，还要选择一两次在寺庙做法事。现在我记不得是出殡，还是哪个“七”日，是在玉佛寺做的，而且头天晚上，我就在寺里守夜，在灵堂复习功课。尽管白天要做道场，和尚诵经好几次，梵音袅袅，晚上却十分安静。

新中国成立后在“亲不亲，阶级分”的环境下，受到各种压力 and 影响，似乎多一分有关“家庭”的概念与情绪都是小布尔乔亚情怀，会成为思想不纯或者革命性不彻底的体现，甚至成为“阶级立场不稳”的严重问题。政治大环境如此，人也跟着少了一些温情。那时为了自保，一味想划清界限，对于家族历史避之犹恐不及，根本不会去了解，却不曾想，自己也因此失去了有关家族的记忆。改革开放后，一次回上海，父亲已经过了90岁了，对当下的事记不住，但很多历史的积淀却牢记于心，他很想把它们释放出来，但苦无机会。有一次我出差到上海，回到家里时，他终于开口，想同我谈谈家庭历史，以及

他本人的经历。当时虽然已经没有了那种“阶级观念”的紧箍咒，但工作还比较忙，主要还是思想上没有这种“寻根”的观念，因此也就没有应声，现在想起来，悔之莫及，依稀能感觉到父亲当时那种无奈和怆然。

父亲剪影

所以现在说起父亲，信息也很寥寥，现在能找到的文字资料只有3份：上面提到的《三代简史》是“文革”中造反派要求写的，当然，这份材料中，主要是检查自己怎样成为剥削阶级的，批判自己的剥削罪行，但毕竟还是保存了家族的历史记忆。另一份是1996年他逝世后上海染料化工八厂所致的悼词，以及我表妹王炼利偶然发现的一本我父亲的简历。

父亲生于1899年，还是清朝光绪期间，小学是随着祖父在慈溪读的。1911年辛亥革命，祖父的店号倒闭，他读到高小三年级（四年制）就辍学回到宁波。第二年13岁时，就随祖父从宁波到上海一家杂货店当学徒，以后主管财务工作，也就是所谓的“账房先生”，因不愿意替老板做假账，辞职不干。从这里也可看出父亲受儒家教育影响之深。

失业了，怎么办？父亲利用这个时机，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，自己掏钱到私人补习班补习国文、英文。这也为后来的

发展打下了一个较好的文化基础。

这样直到1916年，他先后在几家颜料号当过仓库临时工，学习染料化验，以及颜料推销工作，就是过去称之为“跑街”的那种工作。这对他日后试制新产品，开拓市场，应该是大有帮助的。

他23岁时，就任董洪茂颜料号代经理，直到32岁。洪茂的老板是我堂伯父。27岁那年，经朋友介绍，兼任美商恒信洋行的染料销售员。此后，家庭经济条件有所改善。

洋行，最初主要经营进出口业务，主要的工作内容是中介和代理。《马关条约》签订后，各国获得在中国开设工厂的权利，上海洋行才开始投资实业，比如棉纺、机器、造船、造纸、烟草、食品、金融、房地产等领域。那个年代的洋行，大体相当于我们现在理解的“外资企业”，洋行也分为美资、英资、俄资等。俄资洋行早在19世纪就已经落户中国的上海、天津等地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，很多原沙俄的旧贵族被“苏维埃政权”驱逐，逃亡，洋行成为一部分“白俄”的生存依靠和投奔目标。

1936年“八·一三”事变前夕，上海共有29个国家的675家洋行，其中卜内门洋行由英国帝国化学工业公司开设；德孚洋行由德国颜料垄断集团开设，美孚洋行是由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集团掌握；现在仍旧大名鼎鼎的德国西门子那时候也在上海开设了西门子洋行。我父亲工作过的恒信洋行是美国杜邦

化工集团开设的。恒信洋行业务之一也是染料。公司地址在上海市广东路，前段时间，我跟朋友提到恒信洋行，他还从网上搜索到恒信洋行永字牌商标等信息，当年恒信洋行的商品之一是保晒霖牌服装染料，在广告画上还有一句广告词：保晒霖色布永不褪色。

据说，当年洋行招聘要求很高，以父亲的学历，能进入洋行，说明他年轻的时候应该会比较优秀的，至少专业能力比较强。记得我大舅舅张永生后来也是在恒信洋行工作，因为我上小学后，在大舅家曾看到过恒信洋行空白的便笺，但具体职务就不清楚了。

当然，他的主要精力还是在董洪茂颜料号。就是在这家颜料号的试验间，试制成功了硫化元青染料。在我印象里，董洪茂只不过是一个做染料买卖的商店，但想不到它居然还有一个试验间，而且还居然试制成功硫化元青染料。这件事究竟同我父亲有什么关系，我只是从公家在父亲的悼词中看到一些端倪：“董先生年轻时极具创新精神。1922年在董洪茂颜料店的试验间试验制作成功染料硫化元青。”这件事确实有些出乎我的意料。不过也可看到当时民营企业的活力。现在各方面条件要比那时好多了，民营企业的作用正在得到进一步的发挥，我相信，民营企业在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。

但试验间的创新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，却是在几年之后

了。恐怕是由于经济实力所限，直到1932年，父亲才同几位亲朋好友合资，“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染料企业之一，大中染料厂”，所生产的硫化元青染料，被国民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为首创国产染料，免税通行全国，从此改写了硫化元青全部依靠进口的历史。在大中厂，他任常务董事兼营业主任。后来父亲又投资开设信中染料行和中一染料厂，生产硫化元毛皮染料、酸性金黄及偶氮染料等产品，他出任经理。在上述的悼词中，称他为民族染料工业“开创和奠基的老前辈”，恐怕是有事实依据的。

在那样风云诡谲的时代，有点名气也不一定是什么好事情，何况上海是个很复杂的地方。个人的命运总是和时代、历史甚至整个国家的命运捆绑在一起。他所经历的一切也难免烙上时代的印记。

1937年，抗日战争爆发，由于大中染料厂不在租界，因此被日军所占，日方强迫父亲与日商“合作”。父亲是因为笃信儒家教义，“威武不能屈”的原则已成为他的信条，自然托词拒绝。日军恼羞成怒，派出警卫队搜查他的办公室，虽一无所获，但仍借故将他拘押于日军江湾司令部，10天后始获释放，而大中厂则未归还。此时，他应友人之邀，去信中化学品行任经理。抗战胜利后，由于大中厂仍未归还，父亲又同几位亲友合资，成立了中一染料厂股份有限公司，被推任董事兼总经理，直到新中国成立。

我父亲结过两次婚，第一次婚姻育有两子，但不幸母子3人都已亡故。我的妈妈是续弦，小我父亲5岁。他们1928年结婚。婚前还有一段轶事。那时，父亲还在董洪茂颜料店。不知是哪一位牵的线，外婆假扮顾客，到董洪茂颜料店，与员工搭讪聊天，了解父亲的情况。从谈话中了解到老板基本不管事，大小事都是代经理管。代经理工作认真，很有条理，能力很强，和员工相处很好。员工们说的都是赞扬的话。外婆很满意，于是就把这桩婚事定下了。

我父亲笃信儒学，自奉甚俭，待人公道，乐善好施，因此在亲友中威望颇高，被大家称为“敬庄哥”，亲友中有事都会来找“敬庄哥”。

外婆很信任这位女婿。我爸在外婆家族中，威望很高，家里遇到什么大事，都会让我舅舅、舅妈、姨夫、姨妈来找“敬庄哥”商量。

从1930年到1940年，10年间生有7个子女，现在尚存的有5兄妹，大哥贻中比我大一岁，我是老二，弟弟贻诚、小妹贻直都在北京，只有大妹贻平在青岛。

我父母结婚时，经济情况已经有所好转。记得我上小学前，是住在爱文义路（现名北京西路）的一所弄堂房子。二层楼的房子，有一个小天井，楼上是爸爸的大妹夫一家，我们住在楼下，连厨房、厕所在内，大小四间房，大约七八十平方米。但上小学时，我们已搬迁到成都路宝裕坊30号，在那里

住了十来年。那里房间较大，虽然也是二层楼，但有三开间，四家合住，楼上楼下两间东西厢房各住一家，面积较大，其中两家都是我父亲在大中、信中的同事。后来一家迁走，他们的住房也由我们买下，上下两间客厅我们使用得多些。我们住楼上，还多两间过街楼，因此住房面积要宽敞得多，大约总共有200平方米吧。在那里一直住到我去北京上大学。

尽管父亲混迹十里洋场，投身洋行以及工商领域，但全然不是旧小说、电视或者电影里“资本家”的那种形象：西装革履，风度翩翩，成天出入交际场所。相反，在我的记忆里，父亲不仅谦虚、勤勉，还非常自律和洁身自好。他平素无不良嗜好，不抽烟，不喝白酒，偶尔晚餐时烫一小壶黄酒，晚上也很少见他外出应酬。在花天酒地的十里洋场，像父亲这样的，能“出淤泥而不染”现在想来也很难得。当然，这种言传身教具有无穷的力量，在他的影响下，我们兄妹几人无一人喝酒、吸烟。

父亲热心于公益事业，也许是有感于自己的经历，深知学业的重要。新中国成立前，他就投资创办了虹建中学。抗战胜利后，我大哥从黄岩回上海，学校都已开学，他就曾在虹建中学就读过一个时期。“文革”后，父亲以发还的工资几万元为本，成立“细流（意为‘细水长流’）教育基金”，用以资助穷困学生。

父亲年轻时体质差，但他坚持锻炼。我们小时候，看到他

每天早起去公园打太极拳，练推拿，回来后才吃早饭，再去上班。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影响深远，他一生很少生病，到老了仍旧精神矍铄。直到90岁后，他还经常到家对面的绍兴公园打拳。这恐怕也是他能长寿（活到98岁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

父亲对中医学情有独钟，不仅有兴趣钻研，而且还略有天分。一般小毛小病，就自己找些中药服用，曾多次出资翻印《针灸学讲义》，免费分送亲友。他还定制一批艾灸的工具，就是一块长10厘米、宽3厘米的小木板，挖了3个半球形的洞，艾绒放在里面，打结实了，再取出来放在鲜生姜片上，点燃了，搁置在穴位上。我们小时候感冒拉肚时，都是用艾灸治疗的。

那个年代的年轻人，都有一定的国学底子，虽然他学历并不高，但勤学、好学，古文有一定造诣，也粗通英文。记得有一次，父亲突然问我：Always 是什么意思？当时的我不明就里，就答以“永远、永久”。后来我看到他们厂生产的染发剂，中文名“乌尔丝”，英文就是Always，我这才明白那次他问我的用意。

他书法也颇有功底，这是现在的年轻人未必理解的。其实封建时期，甚至在民国，书法是“技能”之一，见字如见人，字是一个人的门面，启蒙教育和家庭教育，都非常注重书法这一科目。父亲小时受过一定的教育，但是现在想来，他一辈子都没有放弃勤学苦练，所以才没有荒废。